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爭論：國際關係學科的科學進展反思

Exploring the Metatheoretical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flections on the Scientific Process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cipline

doi:10.30390/ISC.201309_52(3).0001

問題與研究, 52(3), 2013

Issues & Studies, 52(3), 2013

作者/Author：莫大華(Ta-Hua Mo)

頁數/Page：1-4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3/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309_52\(3\).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309_52(3).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爭論： 國際關係學科的科學進展反思*

莫大華

(國防大學政治系教授)

摘要

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三次大辯論中，廣為人知的是（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辯論，較少為人關注的是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的後設理論爭論，以及因此引發的後設理論研究爭議。後實證主義質疑既有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與知識基礎，更使國際關係學者質疑到底後設理論研究是否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的研究。後實證主義關注的是後設理論層次而非實質理論層次，後設理論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a theory of theory）或是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a theory about theory），或是對（國際關係）理論進行理論性思考，藉以從各國際關係理論中尋找出好的理論。本文目的在於探索這場源自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後設理論辯論涉及到關鍵議題，以及其對國際關係學科知識發展，藉以理解國際關係後設理論辯論，以期國內學者能瞭解而逐漸建立與發展國內尚未熟悉的國際關係方法論。

關鍵詞：後設理論、國際關係方法論、結構與行為主體性、分析層次、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

* * *

每一門學科需要一個後設理論的儲藏庫（inventory），並不時清掃乾淨，因為它總是會產生許多的新見識。

-Georg Sorensen-^①

當實證主義正統主宰了科學哲學，國際關係學科的選擇是非常簡單的，但明顯的，不是科學就是不科學，這可以有效地翻譯成「不是實證主義就是消失」（positivism or perish）。

* 本文曾獲得國科會研究計畫（NSC 100-2410-H-606-005）經費補助，特此致謝。

註① Georg So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00.

-Colin Wight-②

我有點關切太多人花時間討論知識論與形而上學的偉大議題，…但超過某個特定點…關切知識論也許會使我們喪失對主題的洞察力。我們（國際關係）領域的最偉大讀本，是由那些深深沉浸在此主題的人所寫，而不是由知識論學者所寫。

- Kal Holsti -③

壹、前言

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三次大辯論中，廣為人知的是（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辯論，少為關注的是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的後設理論辯論，以及因此引發的後設理論研究爭議，尤其是建構主義主張的本體論中間道路（*via media*, *middle ground*, *middle way*）與知識論中間道路，甚至是「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質疑既有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與知識基礎，更使國際關係學者質疑到底後設理論研究是否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的研究。這些後實證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關注的是後設理論層次而非實質理論層次，④後設理論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a theory of theory*）或是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a theory about theory*），或是對（國際關係）理論進行理論性思考（*a theory in theory*），藉以從各國國際關係理論中尋找出好的理論；實質理論則是關於（國際關係）實際運作的理論，藉以描述、解釋與預測國際關係現象或事務。Alexander Wendt 將實質理論稱之為「第一層級理論化」（*first order theorizing*），後設理論稱之為「第二層級理論化」，前者強調國際體系結構與動態（*dynamics*）的理論化，後者聚焦於構成國際關係學術重要或正當（*legitimate*）問答之本體論與知識論的議題。⑤因此，國際關係學者為探討學科進展與理論學派軌跡於是引用科學哲學作為其基礎的哲學論

註② Colin Wight,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 40.

註③ Adam Jones, "Interview with Kal Holsti,"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3 (2002), p. 623.

註④ 一般而言，所謂的國際關係理論是指實質理論，即是用以描述、解釋與預測國際關係現象或事務的理論。國際關係的主流理論理性主義（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就是實質理論而非後設理論，非主流理論反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與建構主義等）是後設理論，但其中的建構主義則因其有些學者仍致力於提出關於國際關係現象或事務實際運作的理論原則，而具備後設理論與實質理論的性質。屬於後設理論層次的建構主義類型是後現代（後結構）建構主義、批判（詮釋）建構主義，屬於實質理論層次的建構主義類型是實用建構主義、國際規範取向建構主義。建構主義有四個層次：哲學、後設理論、理論化與經驗研究，由於學者未能釐清其間差異而使國際關係的後設理論辯論聚焦於建構主義。

註⑤ Alexander Wendt, "Bridging the Theory/meta-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 383.

述，例如科學實存論、批判實存論、語言分析哲學、實用主義、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等，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也就與哲學密不可分。^⑥這些被稱為後實證主義或反思主義從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而至價值論，重新檢視與挑戰既有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或理性主義，尤其是其中的現實主義理論，進而也成為另一個主流理論，即是反思主義當中的建構主義理論，引發了國際關係後設理論更深入的爭論。

國際關係後設理論就是探討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及其過程，也就是探討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方法論 (methodology)，其中包含科學哲學、本體論、知識論與研究方法。簡言之，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也就是國際關係方法論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如同政治學方法論 (political methodology) 一般，探索政治學理論的建構及其過程，只是國際關係方法論仍未受到相同的重視而已。根據 Milja Kurki 和 Colin Wight 的看法，國際關係的後設理論爭論在於以下的議題，第一，理論的類型，不同的後設理論的假定而有不同的理論類型。第二，對於「客觀性的問題」(question of objectivity) 之不同主張，隨著國際關係理論不同的社會科學哲學假定而有不同。第三，理論檢驗與理論比較的問題，即是如何評估與比較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不同的後設理論假定而有不同的標準。第四，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就是社會研究的目的，不同的後設理論假定而有不同。^⑦這些議題主要是在知識論層次，即是在爭論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論議題。也如同在研究國際關係實質理論時，常會詢問「為什麼要理論？」、「理論能做甚麼？」，研究國際關係後設理論時，就更會詢問「為什麼要後設理論？」、「後設理論能做甚麼？」。若是接受理論具有指導研究、避免偏見、較容易掌握與評估實務現象等功能時，則後設理論具有選擇與評估「好理論」(a good theory) 的功能，也就更為重要了。後設理論即是在論述理論建構的過程，以及提供評估「好理論」的基準，包括何謂「理論」與何謂「好理論」的基準，無論是否是「科學的」或「非科學的」，或是否有「科學的」理論，也就是所謂的「國際關係的 Kuhn 爭論」(Kuhn Debate in IR) 或「國際關係的 Lakatos 爭論」(Lakatos Debate in IR)，甚至是國際關係理論的各次大辯論都是在爭論這些學科科學進展的問題。

源自第三次大辯論中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後設理論辯論，直至今日仍然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上方興未艾，但卻無法超過實質理論或議題的研究，而依然是在後設理論的抽象層次，未能提出具體的實務建議，不免引起學者質疑後設理論的研究價值。但誠如上述引用 Georg Sorensen、Colin Wight 和 Kal Holsti 的觀點所顯示，這樣的後設理論辯論，也已經引起國際關係學者的重視與憂慮。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從科學觀 (idea of science) 開始爭論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標準，進而引發本體論與知識論何者

註⑥ Cerwyn Moore and Chris Farrand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hilosophy: Interpretive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註⑦ Milja Kurki and Colin Wi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7-32.

要緊 (which matters) 的形而上學爭論，促使學者思考國際關係理論知識的進展，甚至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產生正反面的影響。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探索這場源自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後設理論辯論議題中，有關國際關係學科是否是科學？以及對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有何影響？但無意探討理論與實踐的議題，這並不是本文關注的焦點，藉以理解國際關係後設理論辯論，以期國內學者能瞭解而逐漸建立與發展國內尚未熟悉的國際關係方法論。

本文第一部分探討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爭論，論述雙方對於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標準或是否有此標準的爭論觀點。由於科學哲學爭論需要從知識論深入探討，第二部分遂探討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論及其進展的爭論，論述本體論或知識論何者要緊及知識進展的爭論。由於科學哲學的辯論使國際關係學者陷於混淆，於是有些學者將之轉化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爭論，第三部分探討此轉化所涉及的議題及批評。由於建構主義意圖成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中間道路，遂重新引發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爭論，第四部分探討此爭論所涉及的分析層次、個體論與整體論、解釋與理解等議題。第五部分探討實證主義所引發的量化與質化的爭論。第六部分探討後設理論爭論的影響。除了在各部分末尾，提出個人的評論外，最後就後設理論研究的限制提出評論作為結論。

貳、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爭論

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大辯論發生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辯論，是一場有關理論或分析架構選擇的論述，它涉及到著重於後設科學的 (metascientific) 研究單位 (即是典範、科學研究綱領或研究傳統)，特別關注於檢視爭議中的各理論典範的基本前提 (premises) 與假定 (assumptions)。簡言之，即是關注與批判主流理論 (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 的科學哲學立場—實證主義。然而，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實證主義並無一致的定義與主張，例如實證主義是知識論還是方法論，即使是著名學者在運用時也會混淆。^⑧本文接受 Steve Smith 的主張，認為實證主義是以經驗知識論為基礎的方法論立場，^⑨因為當了解到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個研究途徑是堅定的實證主義時，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辯論，就變得更為清晰。^⑩另外，也得以避免在本體論上無謂地爭論存在的本質，這是無法檢證或否證。當然，非主流理論以後實證主義批判實證主義時，也就更加清楚地呈現出國際關係學科的後設科學理論辯論了。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是否是一門科學研究？如何看待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知識發展歷史？尤其是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史的各次大辯論或是如何看待各理論之間的差異？在

註⑧ Colin Wight,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6.

註⑨ 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

註⑩ *Ibid.*, p. 11.

第三次大辯論期間，非主流的國際關係學者引用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觀點反思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發展，包括從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質疑主流理論的理論假定前提，以及檢視國際關係知識的發展，特別是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知識論觀點決定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科學標準，於是雙方爭論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標準或是否有此標準。

實證主義強調藉由因果關係（causation）解釋或以科學分析國際現象，強調外部（outside）因果推論與確認行為者的行為規律；後實證主義則是藉由構成關係（constitution）理解或詮釋國際現象，聚焦於行為者的內部心智與發現行為者行為的意義。^⑪這也就是涉及研究者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爭論，實證主義強調研究者必須客觀進行研究，個人的主觀價值觀不能滲入研究過程與結果之中；後實證主義則是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是詮釋人類社會行為的意義，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都具有主觀的價值觀，研究者藉此產生同理心的詮釋。這即是 Steve Smith 所稱的「當代知識論的辯論」，尋求以後實證主義的替代研究途徑（科學實存論、詮釋論、批判理論、女性立場與後現代主義）超越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知識論基礎。^⑫因為他認為不同的後實證主義研究途徑是在其不同的知識論立場內運作，可以開啓其他思考的空間與其他國際真實（realities）的希望。^⑬然而，根據美國大學院校國際關係相關系所課程與重要學術期刊研究，實證主義依然是占大多數，並未出現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分歧。^⑭換言之，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仍是主流，並不因為非主流理論的後實證主義批評與質疑而喪失其主流的地位。

然而，就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有關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科學觀爭論，有些學者則是主張以綜合觀點來處理。例如 Vincent Pouliot 認為後基礎論比科學實存論更為一致的後設理論，能作為混合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後設理論，即是可以發展主觀知識與被客觀化的知識。他以「主客觀主義」（subjectivism）稱述這種混合主觀與客觀研究的建構主義方法論。主客觀主義是一種三個步驟的方法論，但不是直線性路徑而是可以前後反覆的路徑；第一個步驟是運用演繹方法發現行為主體的主觀意義，第二個步驟是運用詮釋方法將此主觀意義置入於系絡之內，而將之客觀化，第三個步驟是導入時間與歷史而將此主觀意義進一步客觀化。^⑮藉此使建構主義能結合實證主義知識論與後實證主義本體論，而成為理論綜合的中間道路與溝通橋樑。當然，這樣的觀點仍是以 Alexander Wendt 為最著名與最受爭議的學者，尤其他以量子意識或量子社會科學

註⑪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5–91; Alexander Wendt,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special issue (1998), pp. 105–147.

註⑫ 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pp. 25–31.

註⑬ *Ibid.*, pp. 35–38.

註⑭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 459.

註⑮ Vincent Pouliot, “‘Subjectivism’: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07), pp. 359–384. 尤其是 pp. 368–374.

作為其建構主義結合實證主義知識論與後實證主義本體論的基礎。^⑥這種科學哲學的後設爭論似乎難有定論，何況在自然科學仍對量子意識有所質疑，顯示出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各自引述不同的科學哲學觀點相互爭論「科學客觀性」，難有定論。

然而，國際關係理論的科學哲學爭論正隨著 *International Theory* 此期刊的問世而興起新一波的爭論。在發刊的第 1 卷第 1 期中，Nuno P. Monteiro 和 Keven G. Ruby 批判了國際關係的哲學基礎辯論並未如其所承諾而使國際關係更為科學，提升國際關係知識，因此，國際關係是不需要哲學基礎的。他們認為這是由於學者多是以哲學立場相互爭論，意圖建立「獨尊一統的基礎」(imperial foundation)，但是國際關係或是科學哲學都沒有普遍接受的研究標準方式，哲學論證不能也不應作為國際關係研究問題的正當化 (legitimate) 工具，所謂的哲學立場爭論實際是政治爭論。^⑦他們甚至指出：如果各哲學基礎是吸血鬼，那本文的目的就是在驅邪了。^⑧此論文進而引發了在第 1 卷第 3 期以「總之，誰需要科學哲學啊？」(Who Needs the Science of Philosophy, Anyway?) 為名的專題方式進行正反意見的爭論。^⑨

首先是該文的三位審查者 (Fred Chernoff、Milja Kurki 和 Patrick Jackson) 在審查時即表示願意在該文出版後，撰寫回應文章，遂有此專題。Kurki 認為該文從批判國際關係科學哲學爭論的政治，即是政治觀點或立場涉入了爭論之中，是由政治決定一切 (politically charged)，進而主張哲學與政治分開，並且將科學哲學予以抽象了與非政治 (apolitical) 了。但是科學哲學的政治並非該文所指的那麼簡單，需要更為深入的分析兩者之間關係，並不必然某種科學哲學就鑲嵌了特定的政治觀點或立場。^⑩ Jackson 認為該文以科學哲學攻擊國際關係的實質立場，並未解決國際關係誤用科學哲學的問題，並且錯誤地界定各科學哲學立場的基礎特性，其所謂的後基礎論本身也是基礎論或非基礎論。因為知識的哲學基礎是與獨立於心智之外在世界的確鑿 (guaranteeing or warranting) 知識的特定問題緊密關聯，是要解決傳統知識論的問題，以及面對質疑困惑時相信知識；而且，真正的後基礎論是評估各科學哲學基礎 (無論一元論或二元論) 的分析豐饒性 (analytical productivity) 而不是其哲學效度 (validity)。^⑪ Chernoff 認為該文主張避免科學哲學基礎爭論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但卻是以限制或扭曲了對於國際關係理論進一步發展的潛在的豐富多樣爭論，而

註⑥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心物二元論—Alexander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評」，*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 (2010 年 3 月)，頁 29~58。

註⑦ Nuno P. Monteiro and Keven G. Ruby, "IR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1 (2009), pp. 15~48.

註⑧ *Ibid.*, p. 43.

註⑨ Nuno P. Monteiro and Keven G. Ruby, "The Promise of Foundational Prudence: 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99~512.

註⑩ Milja Kurki, "The Politics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40~454.

註⑪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 Faulty Solution to a False (ly characterized) Problem: A Comment on Monteiro and Ruby,"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55~465.

且誤將科學哲學基礎等同於知識論的基礎論 (epistemic foundationalism)，評估標準不一致且混淆了先驗命題的真偽值。因此，他認為進行國際關係研究仍不可避免要進行哲學基礎的分析與選擇，哲學基礎的價值在於協助學者尋找智識上最可擁護的理論，進行好的研究設計與經驗證據。^② Jackoon 認為該文並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決方法，解決國際關係誤用或錯用科學哲學論證的問題。Raymond Mercado 也是認為哲學基礎問題是不可避免的，這涉及國際關係的科學標準，它是否是科學？即使該文主張的後基礎論也是需要探討此問題，避談此問題只能暫時獲得釋放感，很快就被迫去質疑學者的理解與實務者的實務之間是否有差異與如何差異。^③

Monteiro 和 Ruby 回應這些批評時，認為這些評論大致都同意國際關係的哲學基礎爭論是自以為了不起的也是負面作用的，都希望在維持國際關係作為科學學科地位時，超越哲學基礎爭論，只是達成此目標的方法不同而已。應該以哲學態度而非哲學立場的開放想法相互對話。^④

總之，國際關係理論的科學哲學爭論已經成為此學科的一部分，而且是學科基礎的一部分，攸關著評估其知識的進展。這爭論基本涉及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論議題，由知識論議題而衍生出評估其知識進展的議題。唯有落實在知識論上，國際關係後設理論或科學哲學研究，才不會淪為過於形而上的哲學思辨。

參、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論及其進展的爭論

國際關係理論的科學哲學爭論，需要從知識論深入探討，誠如 James Bohman 說得好，國際關係學者久以科學哲學作為爭鬥理論優越性的致命武器。^⑤因此，有關國際關係「科學性」的爭論是仍會持續不斷出現，尤其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論爭論，因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目的在於發展知識與累積知識，這都涉及到知識論的議題，包括是本體論或知識論何者要緊的爭論，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知識進展的爭論。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是要先釐清國際關係的本體存在基礎，還是先要探討其知識的基礎？在第三次大辯論時，後實證主義學者質疑與批判了國際關係既定的本體存在與知識基礎，引發了是本體論要緊還是知識論要緊，以及研究主體與客體、科學本體與哲學本體的爭論，以及引述後設科學的研究單位作為評論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進展之爭論。

註② Fred Chernoff, "Defending fou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66-477.

註③ Raymond Mercado, "Keep Muddl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78-487.

註④ Nuno P. Monteiro and Keven G. Ruby, "The False Promise of Foundational Prudence: 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99-500.

註⑤ James Bohman, "What is to be don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88-498.

一、本體論與知識論何者要緊的爭論

本體論是指研究一切事物或實體的存在基礎，關注的是有關世界存在的本質；知識論是指研究知識的定義、基礎與有效度，關注的是如何獲得有關世界的知識。就知識論提供評斷科學知識的不同基準，知識論可區分為經驗（或解釋）的知識論與理性（reason）（或詮釋）的知識論，前者認為科學知識主要是以人類經驗為基礎，去解釋社會世界。即是人類觀察或其他感官所獲得的證據是建立科學知識的基礎，所有的科學假設都必須是可以此證據驗證的（verifiable）。相對地，後者主張先存的理性（a priori reason）在獲得知識的重要性，人類藉由理性思考推理（reasoning）而獲得知識，此知識是不限於人類經驗之內，它是以同理心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用以理解與詮釋人類的社會世界，人類知識的功能是在反映呈現物體存在本身，以創造此物體的方式詮釋此認知過程。對於此認知過程，又存在著知識論的「真理符應（一致）論」（correspondence of truth）與「真理共識論」（consensus of truth），前者認為（真理）知識有其基礎（foundation），可以探知、追求與發展，而且應該像鏡子般映射事實，與事實存在相一致；後者認為（真理）知識並未存在基礎，無法探知與發展，只是特定社群所共同一致同意的認知與反應，無關於與事實是否一致。^⑥

基本上，客觀的物質主義（objective materialism）的本體論是與經驗論者或解釋式的知識論有關聯，主觀的理念主義（subjective idealism）的本體論則是與理性論者或理解式的知識論有關聯。但也不必然如此，兩者亦可交會，這是個偉大的哲學辯論議題，至今仍無定論。在本體論上，國際關係建構主義者絕大多數是主張主觀的理念主義（idealism）的本體論；在知識論上，建構主義學者也多是詮釋、理解的知識論。但學者的主張仍有程度差異，甚至有極大的差異。^⑦例如，Wendt 是溫和的理念主義，但卻不主張詮釋、理解的知識論，因為他並不認為理念主義的本體論意含著後實證主義的知識論，而是企圖以科學實存論結合理念本體論與實證主義知識論。^⑧甚至以量子力學理論說明兩種知識論是可以互補，以了解國際社會生活。^⑨這是迥然不同於上述既有的本體論與知識論之間的假定關係，也就引發更多的爭論了。

有的國際關係學者關乎本體論的議題，認為本體論比知識論要緊，只要本體論確定了，知識論也就自然確立了；另有學者則認為本體論是無法確定的，只有確定知識

註⑥ 套用禪宗的故事，前者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後者則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前者假定有知識本體的存在，被稱為是知識論的基礎論；後者則是假定沒有，被稱為是知識論的反知識論，但這是沒有定論之事。

註⑦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橋計畫—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第 87 期（2006 年 9 月），頁 221~250。

註⑧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9~40.

註⑨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心物二元論—Alexander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評」，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29~58。

論才能累積知識。在哲學基礎上，前者多是實存論者（科學實存論與批判實存論），後者多是反實存論者。Smith 曾與 Wendt 關於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本體論與知識論何者要緊有所爭論，這場爭論始於 Wendt 評論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所著的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接著連續引發學者對於行為主體與結構以及分析層次問題的爭論。^⑩其中 Roxanne Lynn Doty 與 Colin Wight 也引發相同的一場論戰。^⑪但必須注意強調知識論要緊，並不是爭論知識論比本體論重要，而是本體論的爭議並不能直接訴諸於這世界是如何構成而有定論，而且爭議各方都需要為其主張提出理由。^⑫這使得本體論無法提出證明其主張的理由，而在沒有知識論的依據下成為教條（dogma）。^⑬換言之，知識論要緊並不是因為在本體論假定了結構與行為主體之間的因果關係，或是本體論與知識論之間的因果關係，而是強調知識論與本體論兩者之間的相互關聯，但也沒有主張有最適合的知識論。^⑭主張本體論要緊則是認為本體論論述必須先於實質的知識論問題，而且沒有普遍的（universal）知識論。^⑮以樹為隱喻，行為主體性與本體論是樹根，知識論是樹枝而非單一的樹幹，要能溢出

註⑩ Alexander Wendt, "Bridging the Theory/Meta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83-392;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Beware of Gurus: Structure and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93-410; Alexander Wendt, "Levels of Analysis Vs. Agents and Structure: Part III,"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 (1992), pp. 181-185;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Structure and Action: Further Com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 (1992), pp. 187-188; Walter Carlsnaes, "The Agency-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3 (1992), pp. 245-270;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Two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0, No. 3 (1994), pp. 241-251; Vivienne Jabri and Stephen Chan, "The Ontologist Always Rings Twice: Two More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Reply to Hollis and Smit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1996), pp. 107-110;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A Response: Why Epistemology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1996), pp. 111-116; Stephen Chan, "An Ontologist Strikes Back: A Further Response to Hollis and Smit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3 (1998), pp. 441-443; Heikki Patomaki, "How to Tell Better Stories about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1 (1996), pp. 105-133.

註⑪ Roxanne Lynn Doty, "Aporia: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pp. 365-392; Colin Wight, "They Shoot Dead Horses Don't They? Locating Agency in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1 (1999), pp. 109-142; Roxanne Lynn Doty, "A Reply to Colin W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 (1999), pp. 387-390; Colin Wight, "Interpretation All the Way Down? A Reply to Roxanne Lynn Do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3 (2000), pp. 423-430.

註⑫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A Response: Why Epistemology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p. 112.

註⑬ *Ibid.*, p. 111.

註⑭ *Ibid.*, pp. 112-115.

註⑮ Vivienne Jabri and Stephen Chan, "The Ontologist Always Rings Twice: Two More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Reply to Hollis and Smith," pp. 107-110.

知識論的界線。³⁶也就是由樹根的本體論發散而成許多知識論的樹枝。總之，本體論與知識論是密不可分。有關結構與行為主體之間的爭論，將在第肆部分探討。

就本體論與知識論何者要緊的爭論而言，主張本體論要緊的學者認為不僅本體論與知識論何者要緊有爭論，甚至國際關係學者也對知識論產生爭論，主要是因為反知識論 (anti-epistemological) 或主張知識論無政府 (epistemological anarchy) 的後現代主義，以激進的主觀「理念一路到底」 (ideas all the way down.) 否定科學知識或是知識基礎的存在。後現代主義理論的知識論是最混淆不清的知識論，也是最不容易理解的，遂引發國際關係理論廣泛的知識論爭論，讚許與批評皆有。尤其遭致「1990 年代知識論的大停頓」³⁷與「知識論的憂鬱症」³⁸的極端批評。直至今日為止，國際關係後現代主義理論仍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異議者與非主流，但其也樂於擔任這樣的角色，依然以電影、科幻小說與通俗文化作為其反知識論的文本。³⁹似乎這樣的爭論是不會停止，這也顯示出後現代主義始終堅持的「異議者」角色。

總之，國際關係內部的知識建構與知識累積之爭論，並未涉及知識論立場的改變，而是藉由實質問題鼓勵相互容忍與學習。⁴⁰但無論如何，兩者都需要有建立的基礎或假定的基礎，知識建構強調創造 (知識) 實質，知識累積則主張獲得 (知識) 實質，都強調知識是一個客體，必須藉由方法論的基礎而予以確保。⁴¹當然，這對反知識論或知識反基礎論的國際關係學者而言，仍是有爭議的。但即使如此，這些學者本身也必須面臨知識建構與累積的問題，否則其「知識」對國際關係學科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這也就涉及到國際關係理論知識進展的議題，如何衡量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建構與累積了。國際關係學者遂嘗試引進科學哲學的知識進展觀點，衡量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發展過程與成果。

二、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進展之爭論

事實上，若是以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的觀點看待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各次的大辯論都是關於「科學」的爭論，也就是國際關係研究是不是科學？如何成為一門科

註³⁶ Stephen Chan, "An Ontologist Strike Back: a Further Response to Hollis and Smith," p. 443.

註³⁷ Kalevi J. Holsti, "Along the Roa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the Next Millennium: Four Travelogues," in Robert M.A. Crawford and Darryl S.L. Jarvi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SUNY Press, 2001), p. 86.

註³⁸ Fred Halliday,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ars and Hopes,"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20.

註³⁹ 參閱 D.S.L. Jarvis,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Defending the Disciplin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 ; James Der Derian, *Virtuous War: Mapp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 Media-Entertainment Network*,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 Cynthia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註⁴⁰ Daniel S. Geller and John A. Vasquez, eds., *The Construction and 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註⁴¹ Karena Shaw, "Knowledge, Foundations,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4 (2004), p. 7.

學？其發展的知識是否是科學知識？是否能累積或建構知識？國際關係學者從科學哲學引進不同的觀點爭論國際關係是不是一門科學，甚至如何進行科學的研究，這也證明了國際關係的各項科學哲學爭論仍將持續。在國際關係學科，(科學哲學) 基礎是難以被埋葬的，它們是在(國際關係) 學科各辯論的最前線。^④有些國際關係學者運用科學哲學的後設研究單位概念，例如 Imre Lakatos「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Thomas Kuhn 的「典範」(paradigm) 與 Larry Laudan 的「研究傳統」(research tradition) 評估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進展或是進步與否，以及那個是「好理論」或「進步理論」。^⑤然而，由於學者不同的運用方式，而出現不同的評論，有的學者認為「科學研究綱領」適合用以評估國際關係理論，有的學者則認為「研究傳統」或「典範」較為適合；乃至評斷相互競爭的國際關係理論之中，何者是好理論或進步理論；或者是各理論之間的互補與綜合。誠如 Colin Elman 和 Miriam Fendius Elman 所言，評斷學科的進展需要後設理論，也就是描述與評估不同理論學派軌跡的一種方法。^⑥國際關係學者主要是引述 Kuhn 的典範與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為後設研究單元概念，評估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進展，或是智識發展史 (intellectual history)，藉以呈現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發展軌跡。

事實上，國際關係學者早已運用科學哲學家的概念檢視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發展歷史。例如 Arend Lijphart 首先運用了 Kuhn 的典範概念探討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歷史。^⑦ John A. Vasquez 依循著 Lijphart 的用法，探討國際關係理論的大辯論歷史，認為第一次與第二次大辯論是典範之間 (interparadigm) 的辯論，第三次大辯論是在辯論現實主義典範的適當性 (adequacy)，已非典範之間的辯論而是後實證主義與實證主義的辯論，甚至進而以 Kuhn 的典範概念及 Lakatos 的研究綱領概念評估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⑧ Robert Keohane 在 1986 年也以研究綱領的科學方法論基準讚揚國際關係理論

註② Nuno P. Monterio and Keven G. Ruby, "IR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1 (2009), p. 19.

註③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3); John A.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Degenerate Allia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19-922.

註④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Introduction,"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7.

註⑤ 他認為國際關係理論在 1950 年代發生了科學革命，到 1970 年代行為主義典範成為新典範。Arend Lijphart, "The Structure of Theoretical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8, No. 1 (1974), pp. 41-74.

註⑥ 他以 Lakatos 的「進步的研究綱領」與「退化的研究綱領」觀點，並列出評鑑指標，以歷史個案 (如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 (Crimean) 戰爭、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 與其他學者的觀點，甚至是量化的方式評鑑 Waltz 的「權力平衡」與「結構極性」(structural polarity) 觀點，藉以說明現實主義是個正在退化的研究綱領，並反駁了 Martin Hollis 和 Steve Smith 所認為現實主義典範是主要的典範，因為它比其他典範較為啟發及富有創造力。John A.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A Critiqu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John A. Vasquez, "The Post-Positivist Debate: 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Enqui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Enlightenment's Fall,"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p. 217-240;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899-912; John A.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發展的進步。^①因此，國際關係學者遂以典範或研究綱領看待各個國際關係理論，藉以說明國際關係理論是科學的理論範疇，其理論發展也是循著自然科學史的發展軌跡。主流理論也就成爲典範或進步研究綱領指引著學科的發展。當然，也就會有國際關係學者以典範或研究綱領的科學基準批判主流理論。即是有以評估主流理論現實主義爲觀點，例如 1997 年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針對現實主義出版專輯，意圖藉由 Kuhn 的典範概念與 Lakatos 的研究綱領概念評估現實主義。^②但是這類最爲著名的著作，當屬 Vasquez 的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A Critique*。在 1983 年版中，他就以 Kuhn 的典範概念爲基礎，認爲（國際關係）理論建構、資料產生與研究都如同是一個由典範指導的活動，^③並且以精確（accuracy）、核心（centrality）與科學重要性作爲評估規範的基準，運用量化統計方式論證現實主義在 1970 年代出現異例，而朝向新的典範，但他並未明指是那個典範。^④簡單地說，就是現實主義典範未能指導理論建構、資料蒐集與研究的典範。

在 1997 年，Vasquez 爲配合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編輯的規畫，遂以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概念爲評估基準，評斷現實主義是退步的研究綱領。^⑤後來修訂出版成爲 1998 年版的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除重印 1983 年版爲第一部分外，增加以質化方式（個案研究、歷史分析與理論論證），藉以回應現實主義學者對其以量化統計論斷的批評。他以典範能否通過經驗檢驗（empirical testing）的能力爲評估基準，包括經驗（證據）精確、理論豐富、經驗妥當、解釋力與（政策）相關，檢驗 Waltz 的權力平衡理論，發現其與經驗證據不精確及不一致，尤其對於冷戰結束的解釋力及與政策相關性。總之，他認爲要以自由康德（主義）典範（Liberal Kantian paradigm）作爲替代典範。^⑥

換言之，他在 1983 年版的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原是以 Kuhn 的典範概念爲評估現實主義的基準，企圖藉由量化統計方式評斷現實主義已是出現異例的典範；1997 年的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文章中，則是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概念爲評估現實主義的基準，認爲現實主義是退步的研究綱領。最後，在 1998 年版的 *The*

註① Robert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1-157.

註②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1997).

註③ John A. Vasquez, *The Politics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0-120. 本文以 1998 年版新著爲參考依據，1998 年版的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重印了 1983 年版爲第一部分，故以 1998 年版標註頁次。

註④ 精確是指現實主義典範應該產生可以被否證的假設；核心是指現實主義典範的核心假定應該產生不可被否證的假設；科學重要性是指現實主義的假設未能被否證。

註⑤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1997), pp. 899-912.

註⑥ 1998 年版的書中將 1997 年在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發表的文章修改之後，收入爲第 11 章，並增加對 John Mearsheimer 現實主義的批判 John A. Vasquez, *The Politics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則結合質化與量化兩者藉以評估現實主義是退步的研究綱領。然而，仍有些學者則是為現實主義辯護，例如 Patrick James 以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概念重新檢視結構現實主義，藉由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呈現其作為達成國際關係科學進展的穩定基礎。⁵³

另外，有些學者則是以研究綱領評估整個國際關係理論為觀點，例如 Colin Elman 和 Miriam Elman 則主編了一本非常詳實評估研究綱領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與運用的書籍，第一篇各章匯集國際關係各理論的學者，藉由研究綱領的基準評估其各自的理論之進展，他們都認為各自的理論是進步的研究綱領，也評斷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運用研究綱領的限制與替代方案；第二篇各章則是就第一篇各章提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運用研究綱領的利弊得失，以及如何超越 Lakatos 的科學發展觀點。兩位編者歸結，既不期待也無法發現學者之間對研究綱領的優點有共識，但在測量學科理論進步之前，必須先決定如何測量。⁵⁴完整地呈現國際關係學者對於研究綱領概念理解的不足，囫圇吞棗地運用此概念，或是未經質疑地假定此概念的正確性。

誠如黃旻華與郭銘傑所言，國際關係學者沒有理解 Lakatos 研究綱領的知識論多元主義，誤用於評估比較國際關係理論而使真正的知識論辯論並未發生。⁵⁵然而，個人認為這或許高估了 Kuhn 的典範概念或是 Lakatos 的研究綱領概念在知識論的貢獻，對於自然科學固然有其貢獻，但在社會科學，特別是國際關係學門，卻不具可行性。因為在國際關係學門中，學者並未精確界定與理解這些概念，而是含混模糊地運用。Elman 和 Elman 就指出國際關係學者錯誤陳述與錯誤運用研究綱領的科學基準，甚至對於這些錯誤的批評也是有誤的。⁵⁶ Gunther Hellmann 就批評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常以典範主義 (paradigmatism) 的「不可共同測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區分不同理論之間的界線，但實際並沒有獨立客觀的標準測量典範之間的可共同測量性，更別說要如何適當的區分界線了。⁵⁷或許就如同 David A. Lake 所言，在知識論上，我們應該體認到是有多重有效的理解途徑，而且也許是互補的理解途徑。⁵⁸更重要的是，國際關係的真實世界並未依據國際關係理論運行，實務人員也並未依據國際關係理論決策。甚至更嚴格地說，自然科學也是如此。那麼科學哲學學者又如何能自己建構出單一的評斷知識的

註 53 Patrick Jam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Structural Realism Reconsidered*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註 54 參閱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Introduction,"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3), pp. 11-18.

註 55 黃旻華、郭銘傑，「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國際關係學門的誤用：重新檢視現實主義典範進步或退化的辯論」，*東吳政治學報*，第 24 期（2006 年），頁 117-160。

註 56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How Not to Be Lakatos Intolerant: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2 (2002), pp. 231-262.

註 57 Gunther Hellmann, "In Conclusion: Dialogue and Synthesis in Individual Scholarship and Collective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2003), pp. 147-150.

註 58 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 465.

標準或基準呢？Lakatos 自己就說了，我們無法證明（prove）理論，我們也無法駁斥（disprove）理論。⁹⁹既然如此，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對於科學哲學就應該以更寬容的態度，接受各個理論在知識論的多元差異，就更能理解國際關係的實務了。相對地，國際學者以典範或研究綱領說明其學科知識進展的背後意涵，即是意圖以這樣的方式來「正名」或「證明」其學科是具備如同「(自然)科學」的地位，這更加顯示出其學科的焦慮，未能或尚未發展成一門科學的學科。

肆、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後設理論爭論

面對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關於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爭論，又是如何能具體運用於評估理論之上呢？即使如上所述，學者引述了典範、科學研究綱領等概念，意圖藉以評估國際關係理論。但是大多數國際關係學者並未接受過哲學教育，很容易就混淆或是無法理解，於是有些學者則是以理性主義（rationalistic theories or rationalism）與反思主義（reflectivism）說明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基礎假定之爭論。由於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辯論使國際關係學者陷於混淆，過於爭論本體論議題，也不易理解其間的爭論差異。於是有些國際關係學者將之轉化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爭論，企圖降低學者對於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誤解。此爭論延續成為當前新興的大辯論標題，重組國際關係理論的分類範疇。學者認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以理性效用為共同特質，兩者皆屬於理性主義的範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所以會被學者合稱為理性主義，相當程度地是受到 Ole Wæver 有關「新綜合」觀點的影響。¹⁰⁰或是 John Ruggie 的「新效用主義」（neo-utilitarian）觀點的影響，¹⁰¹以理性主義稱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也就成為習慣了。反思主義的理論分類則是源於 Robert Keohane 對國際制度研究學者的分類，他也將這類學者稱為詮釋主義學者（interpretive scholars）。反思主義是指以社會學途徑研究國際制度，其強調非個人的社會力量的角色，以及無法以利益計算的文化實務、規範及價值的影響，重視國際制度活動的「相互主體意義」，以及人類反思對國際制度性質與世界政治的重要性。¹⁰²後續學者也就以反思主義與詮釋主義稱呼這類的理論主張。它是建立在科學哲學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與知識社會學詮釋主義之上，藉以爭論國際社會關係的本質與討論研究

註⁹⁹ Imre Lakatos, "Falsific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00.

註¹⁰⁰ 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9–185.

註¹⁰¹ John Gerard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9–11.

註¹⁰²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88), pp. 379–396.

此關係的方法，因為在社會世界與詮釋世界，只有理念是重要的，就可以被研究。^⑬ Steve Smith 則將「非實證論」的理論（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規範性理論、批判理論、歷史社會學）歸類為反思主義，而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辯論歸類為理性主義內的辯論。^⑭因此，理性主義是屬於實證主義的知識論立場，反思主義則是屬於後實證主義的知識論立場，只是改以較為不具哲學色彩的名詞。

Keohane 則希望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綜合，建立真正的研究計畫而非教條式的論斷知識論或本體論的優先性，這綜合將有助於理解國際制度實務與特定制度，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這將需要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進行建設性競爭與對話，以及需要對事實進行有理論知識的調查。^⑮然而，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並未能綜合，反而是更加爭論與對立，不僅是在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的後設理論爭議，也在經驗研究的議題上。因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並無共通語言，致使彼此之間相互對話並不多，兩方少有接觸像是兩個敵對陣營在不同的期刊發表論文，參加不同的學術研討會。^⑯兩者之間缺乏壓抑性的容忍，即是各種立場之間是以相同的自我理解為關係形式，兩者也相互缺乏承認對方相同事務的正當性，因為這些事務被連結到相互競爭的社會議程與政治計畫。兩方都視對方是有害的，甚至是邪惡。^⑰因此，對於反思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隔閡，有些學者提出建構主義作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via media, middle ground, middle way*）或溝通橋樑，以呈現反思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綜合。^⑱當然這樣的主張內部也是有著許多不同程度的差異，不能一概而論，而是要以多元的方式或多元主義的觀點看待這場爭論。尤其是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能否歸屬於理性主義，以及理性主義的理性（*rationality*）與反思主義的反思性（*reflexivity*）之爭論。

根據 Fred Chernoff 的研究，反思主義（詮釋建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與批判理論）內部及其與理性主義的後設理論原則差異（如表 1）

註 ⑬ Emanuel Adler,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p. 321.

註 ⑭ Steve Smith,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83-188. 但他後來認為將歷史社會學歸類為反思主義是錯誤的，它應該是更接近理性主義，參閱 Steve Smith,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23.

註 ⑮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pp. 392-393.

註 ⑯ Steve Smith, "Ref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43.

註 ⑰ Ole Waever, "Figure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Introducing Persons Instead of Paradigms," in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22.

註 ⑱ 莫大華，「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政治科學論叢*，第 31 期（2007 年），頁 175-216；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構計畫：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第 87 期（2006 年），頁 221-250。

表 1 反思主義內部及其與理性主義的後設理論原則差異

	詮釋建構主義	後結構主義	批判理論	自然主義／理性主義
1. 語言創造真實與真相	是	是	否	否
2. 一切知識都是局部且是歷史偶然的	是	是	否	否
3. 知識與權力相互產生	否	是	否	否
4. 工具理性被誤認且危險的	是	是	是	否
5. 人類解放是道德要求且是理論的首要目標	否	否	是	否
6. 知識總是反映社會條件且為某人利益服務	是	是	是	否
7. 社會理論普遍原則的不可能	是	是	否	否
8. 反思性與自我促成／自我阻礙預言	是	是	是	否
9. 道德內涵	是	是	是	有些

資料來源：Fred Chernoff, *Theory and Meta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s and Contending Accou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176.

即使 James Fearon 和 Wendt 希望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不要成為是本體論的爭論，因為以本體論與經驗研究詮釋這場辯論會造成零和 (zero-sum) 的景象，而是要務實地將兩者視為是世界政治理論化的分析工具或分析鏡。^⑩然而，還是繼續發生了本體論的爭論，不同於上次強調何者要緊的爭論，此次強調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之間的關係 (二元論或一元論)，以及國際關係知識實踐的哲學基礎，即是不以本體論與知識論探討而是以兩種不同的本體論 (科學的本體論與哲學的本體論) 探討，前者探討特定觀點所存在的實體 (entities) 與客體，後者則是為此特定觀點提供必要的概念基礎，個體論與國家論是前者，二元論與一元論則是後者。因而，藉由更精確的概念而突出 (foregrounding) 本體論。^⑪

然而，也由於建構主義的中間道路立場而使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關係，重新成為爭論的議題，爭論行為主體 (行為者)、結構 (外在環境) 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何者決定了兩者互動的結果，是行為主體的選擇還是結構的力量。進而，兩者相互建構成為建構主義的理論特點，所要爭論的議題又衍生出兩者相互建構的過程。

註⑩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 67; pp. 52-54.

註⑪ 這是針對建構主義內部的本體論與知識論之間的矛盾提出，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Foregrounding Ontology: Dualism, Monism, and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8), p. 151.

伍、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爭論及其相關的爭論

國際關係對於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爭論，並非始於第三次大辯論，早在 1950、1960 年代 Harold Sprout 和 Margaret Sprout、1970 年代 Harvey Starr 就已經將此爭論引進國際關係領域。^①但這爭論受到國際關係理論學者關注，則是由 Alexander Wendt 與 David Dessler 為主張結構化理論 (structuration theory) 所引發。^②後續還有 Walter Carlsnaes 與 Roxanne Lynn Doty。^③歷經這兩代或兩波的學者，這項爭論已經發展成涉及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議題，尤其是本體論議題是涉及行為主體與結構的概念化與相互關係；知識論議題涉及主觀本體論並不相容於實證知識論而是需要詮釋知識論；方法論議題涉及變數之間因果關係的假定 (postulation) 所需要的解釋變數是被外因化 (exogenized)，以及涉及行為主體與結構爭論的鑲嵌歷史性質 (historically embedded nature)。^④2000 年後，延續第二代或第二波的爭論之後，第三代學者對於此爭論所呈現的問題過於後設理論層次而感到挫折，除了尋求其它哲學理論或自然科學理論延續探討外，^⑤也將此爭論具體落實在實質理論或經驗研究層次，藉由聚焦於在不同 (分析) 層次的行為主體元素 (如抉擇、反思性、轉型能力及學習) 與結構之元素 (如物質能力、規範結構與制度)，而強化其理論或研究。^⑥然而，本質上，行為主體

註①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6) ;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A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8) ; Harvey Starr, "'Opportunity' and 'Willingness' as Ordering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Wa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4, No. 4 (1978), pp. 363-387.

註② Wendt 是主要引述 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Dessler 則是引述 Margaret Archer 的形態發生 (morphogenesis) 論。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335-370;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1989), pp. 441-473; Alexander Wendt, "Levels of Analysis Versus Agents and Struc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 (1992), pp. 181-185.

註③ Walter Carlsnaes,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3 (1992), pp. 245-270; Roxanne Lynn Doty, "Aporia: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pp. 365-392.

註④ Gil Friedman and Harvey Starr, *Agenc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Ontology to Empirical Inqui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註⑤ 例如強調前兩波所忽略 Robert Cox 的批判理論或是新葛姆西觀點 (neo-Gramscian perspective)，參閱 Andreas Bieler and Adam David Morton, "The Gordian Knot of Agency-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Neo-Gramscia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1 (2001), pp. 5-35; Jonathan Joseph, "Hegemony and the Structure-Agenc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cientific Realist Contribu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8), pp. 109-128.

註⑥ Kate O'Neill, Jorg Balsiger, and Stacy D. VanDeveer, "Actors, Norms, and Impact: Rec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7 (2004), pp. 149-175.

性與結構的爭論是本體論的議題，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議題是源自不同的理論如何解決此本體論的結果。^⑦未能理解此點，就會混淆了行為主體與結構、分析層次（levels of analysis）與微觀宏觀（macro-micro）等問題，^⑧以及方法論上的個體論（individualism）與整體論（holism），^⑨還有知識論上有關解釋（explaining）與理解（understanding）的問題。根本上，甚至是有關國家行為主體性（state agency）的爭論。

一、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爭論

誠如上述，在建構主義出現之前，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爭論就已經存在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但建構主義強調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相互建構性，而引發新的爭論，主要就在這相互建構性。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爭論強調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界線不可能性，以及行為主體在處於多重結構之內，而且行為主體性（agency）不是特定於行為主體，也是藉由結構的屬性而呈現，但此爭論仍存在著如何理解說明行為主體與結構整合的研究過程。^⑩這場爭論從 1960 年代開始，歷經三個世代的爭論，第一世代是以生態三體合一（ecological triad）：實體（entity）、環境（environment），以及實體與環境關係（entity-environment relationship）表示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關係，並以此三體合一結合環境的機會與實體行動的意願之架構，探討世界政治的議題（例如戰爭）。^⑪第二世代是 1990 年代的爭論，爭論行為主體與結構的概念化與相互關係，以及主觀本體論與詮釋知識論相容的關係。

依據 Alexander Wendt 的說法，結構沒有行為主體不行，行為主體沒有結構也不行（There are no structures without agents, and no agents without structures.）。社會過程總是被結構了，社會結構總是在過程中。^⑫但他是以社會關係中的角色（roles）看待行為主體，忽略了行為主體本身的主觀特性，即是行為主體啟動（transact）了此過程。Harvey Starr 就認為可以藉由電腦模擬發展綜合行為主體與結構的適當方法，^⑬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就有「以行為主體為基礎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s），以電腦模擬模型處理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相互影響（建構）關係。^⑭或是以複雜理論

註⑦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4.

註⑧ *Ibid.*, pp. 102-120.

註⑨ 有些學者將個體論稱為意志論（voluntarism），將整體論稱為結構論（structuralism）、集體論（collectivism）。

註⑩ *Ibid.*, pp. 292-293.

註⑪ Gil Friedman and Harvey Starr, *Agenc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9.

註⑫ Alexander Wendt, *The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86.

註⑬ Harvey Starr, "Cumulation, Synthesis, and Research Design for the Post-Wave,"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43-58.

註⑭ Robert Axelrod, *The Complex of Cooperation: The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C. Earnest, "Coordination in Large Numbers: An Agent-based Model of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2 (2008), pp. 363-382; Matthew J. Hoffman, "Agent-based Modeling," in Audie Klotz and Deepa Prakash,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luralist Gui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87-208.

(complexity theory) 及複雜調適體系 (complexity adaptive system) 處理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動態過程。^⑤這樣的相互建構的過程是可以出現在各個分析的層次，無論是在那個層次，只是個體層次較為強調行為主體性的作用，整體層次較為強調結構的作用。誠如學者所引喻的這是一個「難解之結 (哥帝安結)」(Gordian knot)，^⑥此爭論是沒有結論的，也是沒有辦法解決。但若能以相互補充的觀點看待此爭論，則皆有助於更為理解與解釋國際關係實務。

二、分析層次的爭論

分析層次的爭論是不同於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爭論，^⑦分析層次是關於研究者假定研究問題的解釋因素之所在，或是其分析焦點或對象之所在，或是兩者皆有。也就是研究者在研究開始，基於研究設計的便利與效果，就必須選擇分析層次作為起點，是要個體層次或整體層次、微觀或宏觀的分析、見樹或見林，求深度或求廣度。然而，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分析層次的實質內容與層次數目仍莫衷一是，對於重要議題也未有定論或解答。^⑧例如 Kenneth Waltz 認為是解釋戰爭發生的因素範疇，其強調國際體系層次的解釋因素；^⑨J. David Singer 則認為是研究的現象或分析的焦點，分析層次的選擇影響了理論或模型的描述、解釋與預測的正確性；^⑩Barry Buzan 認為涉及兩者。^⑪這兩種分析層次的意涵是有所不同，卻又是相關聯的。例如全球層次的分析焦點是能以主導此層次的國家行為者來解釋，也能以主導這些國家的領導者來解釋，或是以全球層次的氣候變遷、資源匱乏或文明衝突來解釋。另外，分析層次的數目是可以從兩層 (例如國家與國際)、三層 (個人、國家與國際)、四層 (個人、國內、國際與全球) 到數層，這並沒有孰是孰非，或是偏全之論，而是隨著研究者的信念與分析焦點而定，也就是研究者認為最能解釋其研究問題的分析層次。例如同屬相同理論學派的學者，Hans Morgenthau 的傳統現實主義強調個人層次，^⑫Morton A. Kaplan 的現實主義

註^⑤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43-62.

註^⑥ 此隱喻是源自希臘神話，意指難解之結或死結，只要打開此結，就能統治東方 (亞洲)，多人嘗試未能打開此結。Andreas Bieler and Adam David Morton, "The Gordian Knot of Agency-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Neo-Gramscia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1 (2001), pp. 5-35.

註^⑦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02-103.

註^⑧ 分析層次的爭論始於 1950 年代的第二次大辯論，並且對此大辯論產生重大影響。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Steve Smith and Ken Boo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Oxford: Polity Press, 1996), pp. 198-216.

註^⑨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60.

註^⑩ J. David Sing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12, No. 3 (1960), pp. 453-461.

註^⑪ 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pp. 211-212.

註^⑫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78).

強調國家層次，^㉔ Kenneth N. Waltz 的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層次；^㉕ 不屬相同理論學派的學者，Alexander Wendt 的建構主義與 Waltz 同樣強調國際體系層次，卻是強調行為主體性（即理念）而不同於 Waltz 強調（物質）結構。這也就是方法論上的個體論與整體論爭論，或是層次由下而上（bottom-up）與由上而下（top-down）、微觀層次（mirco）與宏觀（marco）層次、單元與系統的爭論，^㉖ 更簡單地說，就是見樹或見林的（seeing tree or forest）爭論，即是研究廣度與深度的問題，這是方法論上的選擇而非定律，端賴研究者的研究問題及其信念而定，或只是研究者的分析策略而已。

然而，即使是相同理論學派的學者之間常是以不同的分析層次相互批評，以顯示其分析層次的重要性。就普遍運用而言，學者多引述 Kenneth Waltz 的三層次的影像分析層次（three images analysis）為分析，即是個人、國家與國際（國家）體系，或是批判其層次分析的觀點。^㉗ 然而即使 Waltz 將分析聚焦於第三層次的國際（國家）體系，但仍認為這三個層次都是國際關係本質的一部分，第三層次描述了世界政治的架構，但沒有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就無法知道是甚麼力量決定了政策；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描述了世界政治的各種決定政策的力量，但沒有第三層次，就不可能評估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預測其結果。^㉘

藉由分析層次的爭論，國際關係學者多已不再運用單一層次的分析層次，而是藉由整合各層次成為多（multiple）層次或相互（dyadic）層次的分析層次，^㉙ 意圖既重視部分又重視整體、見樹又見林、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當然，這並不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困境，而是程度的差異或交換的問題，是由研究者選擇而定。但整合或混合各分析層次，仍無法解決此問題，畢竟這涉及研究者要如何呈現其研究成果的問題，並無既定的標準。無論如何，分析層次的選擇與推論仍必須注意方法論的個體論與整體論，方不致產生謬誤，因為個體與整體的資料必須在相同對應的分析層次上，才能進行推論而無謬論。例如國家決策菁英的人格資料是屬於個體的分析層次，就不能推論出國家層次的結論。其次，在微觀與宏觀層次上，國際關係學者（如 Wendt）選擇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途徑是著重個體層次，即是假定國家是具有人格而能互動，國際體系是國家互動所形成；國際關係學者（如 Michael Mann）選擇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途徑則是重視宏觀層次，即是假定國家只是國際體系宏觀結構

註^㉔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57).

註^㉕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註^㉖ 當然有些學者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為個體與總體是分析單元（unit-of-analysis）的問題，例如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5.

註^㉗ James Lee Ray, "Integrating Levels of Analysis in 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3, No. 4 (2001), pp. 355~388.

註^㉘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38.

註^㉙ James Lee Ray, "Integrating Levels of Analysis in 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3, No. 4 (2001), pp. 355~588.

的單位，國際體系宏觀結構自有其歷史演進過程，國家是受此演進過程所限制。

三、方法論個體論與整體論的爭論

行為主體與結構的爭論也衍生出微觀與宏觀的爭論，即是方法論個體論與整體論的爭論，方法論個體論認為在描述、解釋與預測現象上，個體、部分或單元是比整體、全體與系統更為重要，一切的整體、全體與系統都能化約成個體、部分與單元的屬性或作用及結果；整體論則是認為相反，整體也有其屬性，甚至影響了個體。整體不只是個體的總和，也涵括了個體之間的累積和。簡言之，就是各個體排列組合（ C_m^n, P_m^n ）而成的累積總和（ Σ ）。個體論與整體論是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關係的不同假定，個體論是由下而上的方式，從行為主體個體的行動及互動而發展至整體結構；整體論是由上而下的方式，從整體結構而至行為主體個體的行動及互動。無論採取個體論或整體論，兩者並非對立的立場，而是互補的立場，都只是研究者選擇的問題，並無何者為佳的問題，而是研究者認為適合與否的問題。若是採取個體論，即是假定個體行為決定了社會行動；若是採取整體論，則是認為社會結構決定了社會行動。就國際關係理論而言，以行為主體（國家）為中心的傳統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多是假定行為主體（國家）是單一的（unitary），其偏好與認同都是固定的，基於效率或效用而採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的個體論；⁹⁹國家的理性抉擇決定了國際體系的國家行為，這樣的理性抉擇個體論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上已有長久的歷史，尤其在戰爭（安全）研究與合作議題及集體行動議題上，也仍會是有用的理論架構。¹⁰⁰然而，以結構為中心的結構現實主義，則是以整體論為假定，強調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主體）的限制，¹⁰¹但卻是將此國際體系結構化約成國家的屬性，實是個體論的假定；但建構主義則是強調結構與行為主體相互構成，既可以行為主體為中心的個體論立場，如 Christian Reus-Smit，¹⁰²也可以結構為中心的整體論立場，Wendt 即是此立場。¹⁰³

換言之，國際關係理論的個體論與整體論之爭論，實是研究者本身選擇的方法論立場，而非不同理論之間的本體論爭論，但這卻是關乎知識論的爭論，也就是解釋與理解的爭論，即是科學解釋與詮釋理解之間的爭論。

註 99 有關理性抉擇論的觀點，參閱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87-112.

註 100 Andrew H. Kydd,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Rational Choice,"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25-443.

註 101 Christian Reus-Smit,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al,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 102 Christian Reus-Smit,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al,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 103 Alexander Wendt, *The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6-32; 371-372.

四、解釋與理解的爭論

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爭論更涉及到知識論上關於主觀理解與客觀解釋的爭論，即是行為主體是由行為者內在的主觀理解，結構是由外在環境的客觀解釋，前者對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關係，假定是構成關係則強調行為主體性，以理解為知識研究的方式；後者假定是因果關係則強調結構，以解釋為知識研究的方式。這也就是所謂「說故事的兩種方式」(two sorts of story to tell)，前者是故事內人物的說故事方式，後者是旁觀者的說故事方式。^⑩無論何者，所涉及的爭論是在於如何理解或解釋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互動過程，就是說明其間的構成關係或因果關係，乃至兩種關係能否整合。但構成關係的分析式是較為靜態，因為難以探索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互動的歷史過程。^⑪這也涉及到分析層次與個體論及本體論的問題，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層次，從個體論或整體論的選擇，也都是在探究最佳的解釋與理解世界之方法，而不在探究世界的真實。^⑫

由於國際關係學者對於行為主體與結構在本體論上的假定不同而有不同的知識論主張，假定兩者是不相容的物體，遂認為在知識上解釋與理解也是不相容的，不能混合而成解釋式的理解或理解式的解釋。^⑬就是以行為主體為基礎的解釋(實為理解)，是與真實的、為什麼的及歷史的分析有關，以結構為基礎的解釋則是與可能的、如何的及抽象的因果解釋有關。^⑭換言之，前者是理解而後者是解釋。然而，如果假定行為主體與結構是相容的物體，則行為主體與結構相互建構，解釋與理解也就能混合了。^⑮當然這樣不同的爭論觀點，也就是各自選擇不同的立場，難以確定理解與解釋之間的關係了。但必須注意這兩者並不同於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解釋並不就是科學，理解就不是科學。^⑯簡言之，理解或解釋並非判定科學與否的標準。

綜合上述，行為主體與結構及其相關爭論的根本議題是關於國家行為主體性(state agency)的爭論，國家的行為主體性能否化約成國家領導者的個體行為？或是由國際體系結構所限制？或是國家本身就具備行為主體性？若是國家並非是有意識的、有心智的行為主體，則上述的各項爭論也就沒有意義了。^⑰尤其是Wendt主張

註⑩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7.

註⑪ 參閱 Alexander Wendt, *The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81.

註⑫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97~203.

註⑬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Two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0, No. 3 (1994), pp. 241~251.

註⑭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35~370.

註⑮ Walter Carlsnaes, "The Agency-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3 (1992), pp. 245~270;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335~370.

註⑯ Alexander Wendt,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Special Issue (1998), pp. 101~117.

註⑰ 作者同意這些爭論對於熟知科學哲學或方法論的專業學者是過時的，但相信目前國內有些國關學者就混淆了這些議題，不知行為主體性與結構的爭論是本體論的議題，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議題是源自不同的理論如何解決此本體論的結果。致使其不是分開探討這些議題，就是隨意混雜這些議題，乃至誤解解釋是科學，理解不是科學。

「國家如人」(state as person)、「國家也是人們」(states are people too) 的個體論引發的爭論。他認為國家是具備人的資格 (state personhood)，它是心智的社會建構體，是個集體意圖 (collective intentions)、集體意識、超級有機體 (superorganism)，是具備自我組織 (self-organising) 性質的心理人 (psychological person)，此性質不能化約到所處的社會系絡。^⑩其他學者如 Iver B. Neumann 則是認為「國家像人」(state like person)，這只是類比、比較與隱喻，應該以有機的隱喻看待，不應以「國家如人」限制學者對世界政治實況的理解。^⑪Colin Wight 以哲學本體論與科學本體論的觀點探討國家的行為主體性，前者討論國家是否存在後者探討國家是否擁有人類的屬性，他認為國家是存在的，但 Wendt 將國家賦予人的屬性或資格不僅剝奪了人的行為主體性 (human agency)，也阻擋了國家作為結構所具有的力量。^⑫Patrick Jackson 同意 Wendt 「國家也是人們」的主張，並進一步主張「人們也是國家」，即是兩者都是在確定系絡內施展行為主體性的社會行為者，但本質上並非如此。^⑬即使這些學者對於國家能否賦予人的屬性的主張有所不同，但都確定國家的行為主體性只是程度差異。換言之，所爭論的是個體論的國家行為主體性與整體論的國家行為主體性間的程度差異。前者在於國家具備如同人一般的屬性，例如動機、目的、利益、習慣、理性、認同等，甚至包括性別，^⑭這些屬性決定了國家的行為主體性。後者在於國家的行為主體性是由國家構成的國家體系 (state systems) 所限制或決定。

就國際關係理論而言，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皆從個體論假定國家如同人們具有理性，是理性的行為者，雖受到外在的物質結構的限制，仍能趨利避害追求利益達成目的。建構主義則是從整體論假定國家具有人的屬性，例如 Wendt 的建構主義則是從整體論假定國家是如同一個整體的行為主體 (as a corporate agent)，它的行為主體行動 (agential activity) 構成了國家體系 (states system)。^⑮這種賦予國家人格化 (anthropomorphizing) 的方式，也正是結構與行為主體性爭論中所涉及的根本問題，即是國家行為主體性的來源與自由意志度 (free-willing)，或是國家是否有知識的 (knowledgeable) 或有意圖的 (purposive)，以及個人成員與國家能否連結等問題。

總之，行為主體與結構的爭論焦點也就是在於行為主體與結構是否是兩個獨立互

註⑩ Alexander Wendt,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89-316.

註⑪ Iver B. Neumann, "Beware of Organicism: The Narrative Self of the 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59-267.

註⑫ Colin Wight, "State Agency: Social Action without Human Activ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69-280.

註⑬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Hegel's House, or 'Peoples are States to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81-287.

註⑭ 有些學者例如 Jill Steans 認為方法論的個體論造成性別議題在國際關係研究的不顯眼或邊緣化，因為它將國家高度抽象成爲關鍵的行為者，現實主義更將國家行為者建立在「握有主權的男性」(sovereign man) 的形貌上。Jill Steans,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sues, Debat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New York: Polity, 2006), p. 33.

註⑮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93-245.

不相容或互不相屬，或是如硬幣的一體兩面共存呢？若是以陰陽太極說明就能稍微清楚了，陰陽分而合，所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化合而使太極運轉。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就是呈現兩者共生共存的關係。若是以多重行為主體與結構說明，則是以鑲空的多層象牙球呈現兩者之關係，結構是構成各層象牙球的象牙材質，行為主體是各層象牙球上的刻花，相互構成各層的象牙球，不同的行為主體與結構構成不同層的象牙球，各層是共存於相同的時空，並且共同構成整體的多層象牙球。簡言之，行為主體與結構是互不相容，但卻又相互蘊含，藉由兩者的變化關係而呈現出在不同的層次分析、個體論與整體論，以及解釋與理解的層面，難以確定其形貌，端賴研究者的研究設計與選擇。即使在質化與量化的研究方法爭論上，亦復如此，或許更能兩者兼用，藉以蒐集與分析資料，推論其研究主張與研究發現。

陸、質化與量化的研究方法爭論

相較於上述的爭論都是在較為抽象的本體論與知識論上，質化與量化的爭論則是較為屬於方法論上具體的經驗層次。1960、1970年代的第二次大辯論受到實證主義科學觀的影響，行為主義強調量化的研究方法，逐漸受到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的重視，^⑩尤其是戰爭研究、和平研究、國際衝突研究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其中著名的「戰爭相關計畫」(Correlates of War)更是帶動國際關係量化研究的先驅。^⑪無論是形式模型(formal modeling)、^⑫賽局理論(game theory)、^⑬統計分析方法，^⑭甚至是實

註^⑩ James Lee Ray, "Reflections on Millennia, Old and New: The Evolution and Role of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103-115.

註^⑪ 此計畫是由 J. David Singer 於 1963 年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師生成立，以統計分析方式探討戰爭模式，以及相關因素與數據資料。1990 年代末，Singer 退休後，此計畫移到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改由其他學者接續，其專屬網站網址 <http://correlatesofwar.org/>。參閱 J. David Singer, "One Man's View: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in Charles Gochman and Alan Sabrosky, eds., *Prisoners of War? Why Nation-States in the Modern Era*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0), pp. 11-28.

註^⑫ Michael Nicholson, "Formal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23-42; Duncan Snidal, "Formal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p. 227-264.

註^⑬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ccomplish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A Game-Theoret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59-80; Steven J. Brams, "Game Theory in Practic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Applying It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81-96.

註^⑭ Bear F. Braumoeller and Anne E. Sartori,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Statis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p. 129-151.

驗方法。^⑭例如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的「國際溝通與談判模擬計畫」(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imulations project, ICONS) 就是著名的電腦模擬實驗計畫。^⑮

隨著國際關係研究強調量化研究課程訓練、相關數據資料庫的建立、電腦模擬程式與統計分析套裝軟體的發展迅速及成本降低，使學者更容易運用量化分析作為研究方法，促使量化研究的著作增加。根據一項調查，從 2002 年起，美國重要的國際關係學術期刊越來越多刊登量化研究方法的論文，但與使用統計分析方法為主要方法的學者數目之間不成比例。^⑯換言之，國際關係研究的量化學者仍是相對的少數。但量化研究方法仍是經驗研究的有力且有價值的工具，它協助檢驗理論的預測能力。^⑰

相較於量化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並未具有明確的運用指南，但也沒有因此或因為量化研究方法的批評而喪失其主流的地位，由於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發展、新世代大學生多重研究方法的訓練、*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一書引發的質化與量化爭論、美國政治學會新成立了「質化研究方法小組」(Organized Section on Qualitative Methods)，以及 2001 年成立的「質化研究方法協會」(Consortium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反而更加精進與發展許多新的方法。^⑱例如過程追蹤 (process tracing)、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解釋類型學 (explanatory typologies)、反事實推論法 (counterfactual analysis)、質化比較分析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甚至是結合量化與質化的模糊集合分析 (fuzzy sets analysis) 等方法。甚至在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內部，也由於量化研究方法的興起，有些學者戮力於將量化研究方法引進運用在質化研究方法最後的安全天堂 (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 之內而成爲「新女性主義」(neofeminism)，提升女性主義理論對於性別平等與社會正義的研究。^⑲

不同於上述的各項爭論，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的爭論並不激烈，這主要是因為其選擇涉及到得失交換，無論那一個研究方法都無法滿足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反而促使研究方法的多元，即使現在仍有所不足，仍需要打破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知識論兩極化造成的障礙。^⑳包括藉由混量化與質化的多元研究方法，以及提出具體

註^⑭ Natalie Florea Hudson, "The State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IR: An Analytical Surv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2 (2010), pp. 165-192.

註^⑮ 此計畫原先是在室內由學生擔任各國或國際組織重要人物的角色，藉由想定的各種狀況進行模擬實況的國際溝通與談判過程，後來則是以電腦軟體程式而進行線上模擬，此計畫的專屬網站網址 <http://www.icons.umd.edu/>。

註^⑯ Daniel Maliniak, et 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p. 439.

註^⑰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on C. Pevehouse,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81-498.

註^⑱ Andrew Bennett and Colin Elman, "Qualitative Researc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ase Study Method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2006), p. 456.

註^⑲ Mary Caprioli, "Feminist IR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2 (2004), pp. 253-269.

註^⑳ Audie Klotz and Deepa Prakash, "Introduction," in Audie Klotz and Deepa Prakash,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luralist Gui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3.

的質化方法運用指南。例如美國政治學會員成立的「質化研究方法小組」改名為「質化暨多元研究方法小組」(Organized Section on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s)；「質化研究方法協會」也成立一個「質化暨多元研究方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學者也致力於撰寫較為具體的運用指南，^⑩甚至藉由質化方法說明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結構與行為主體相互構成過程，先以宏觀歷史、探源學、參與觀察等方法說明結構的形成，再以敘述、架構與民俗學等方法說明行為主體性的形成。^⑪學者對於質化與量化的研究方法爭論也就趨向採取折衷主義，以整合或是多重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⑫換言之，量化研究法或是質化研究法並非是評斷國際關係學科是否是科學的判準，仍然只是研究者的研究設計與選擇的問題。質化與量化都是相同的推論邏輯(logic of inference)，好的研究設計需要量化與質化兩種研究方法。^⑬因此，國際關係學科是不能以量化或質化作為判定其是否科學的判準，而它只是依據研究問題進行研究設計所做的選擇而已。

從上述的各項爭論來看，似乎國際關係的後設理論爭論仍是尚無定論。但無論如何，誠如 Colin Wight 所言：

當實證主義正統開始摧毀一個較多元國際關係學科的高度希望，也就是一個較不奠基於嚴格決定論的科學觀，而且更對引進另類思想模式負起責任的國際關係學科而言，現今是這樣的情況嗎？不幸地，不是這樣的情況。國際關係學科無法搖動實證主義正統，因為其從未理解過它……而只是將新興思想模式灌注到舊分析架構。^⑭

即使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基礎遭致其他非主流理論以後實證主義批判，但仍未改變主流理論的領導地位。根據 Richard Jordan 等人進行的 2008 年十國國際關係學者調查，確認 Steve Smith 所言，美國學者與其他大多數國家學者之間的差異是在知識論，前者多是實證主義，後者則多是非實證主義或後實證主義，但國際關係學科仍是由美國所主宰。^⑮而且十國受訪者都估計認為今日國際關係文獻都大半（超過

註^⑩ Audie Klotz and Deepa Prakash,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luralist Gui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註^⑪ Audie Klotz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註^⑫ David Collier and Colin Elman,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Publication, and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on," in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79-795.

註^⑬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註^⑭ Colin Wight,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0.

註^⑮ Steve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1 (2002), p. 81; Richard Jordan, et al., *One Discipline or Many?: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en Countries* (Williamsburg, VA: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2009), pp. 10-11.

50%) 在討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而且除愛爾蘭之外，現實主義稍微超過自由主義。^⑩這說明了國際關係理論學科仍是在此辯論之中，主流理論仍是掌握在實證主義的手中，當然後實證主義的建構主義也是主流理論之一了，因為受訪者認為過去二十年最有影響力的國關學者依序是 Keohane (自由主義)、Wendt (建構主義) 與 Waltz (現實主義)。^⑪

換言之，國際關係的後設理論爭論或研究多是沒有定論，常是以辯證邏輯的方式呈現爭論過程，即是以正反相對 (thesis and antithesis) 的立場作為爭論起點，而後出現相合 (synthesis) 的立場，此三種立場個別是由學者自行選擇而相互爭論。若以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或理性主義為正論，批判主流理論的後實證主義或反思主義則為反論，兩者之間就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合論 (如表 2)。雖然無法改變實證主義的主流領導地位，但卻有顯示出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的豐富性。

表 2

	正論 (實證主義、理性主義)	合論	反論 (後實證主義、反思主義)
本體論	客觀	主客觀相合	主觀
	物質	理念物質相合	理念
	科學本體	科學哲學相合	哲學本體
知識論	結構	相互建構相合	行為主體性
	解釋	理解解釋相合	理解
	因果關係	因果構成相合	構成關係
方法論	分析層次 由上而下	分析層次 上下相合	分析層次 由下而上
	整體論	個體整體相合	個體論
	量化	質化量化相合	質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然而，有些學者則是質疑國際關係理論被簡略地歸類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或是以二分法的方式歸類，例如 Cameron G. Thies 運用 William N. McPhee 的形式理論模型，認為新現實主義是一個單一檢視系統 (a single screening system) 的邏輯，新自由主義則是一個重覆檢視系統 (a repetitive screening system) 的邏輯，而證明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內在邏輯一致性，但作為一個系統理論，新自由主義的重覆檢視系統是較能掌握國家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兩者並不如建構主義所主張的是單一、基本模型的不同差別，其所提出的理由也不必然，兩者差異是以國際體系的程序與結構的草率分類為基礎，這是一種誤解。^⑫換言之，Thies 質疑到底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能否綜合成理性主義。另外 Steve Smith 認為反思主義的各理論並不像理性主義理論累加成

註^⑩ Richard Jordan, et al., *One Discipline or Many?* p. 41.

註^⑪ Richard Jordan, et al., *One Discipline or Many?* p. 43.

註^⑫ Cameron G. Thies, "Are Two Theories Better than One? A Constructivist Model of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5, No. 2 (2004), pp. 159~183.

一個理論立場，也更無法將兩者混合。此外，反思主義的各理論也沒有像理性主義各理論擁有相同的建構知識觀點。所以，展望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辯論是低的，兩者是以非常不同的方法觀看世界政治。^⑳尤其反思主義以「反思性」作為批判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基礎，其內部對於反思性存有不同的認知與理解，甚至引述不同的知識傳統探究反思性作為其批判的基礎，反而造成更多的混淆，也無法與主流理論相匹敵。^㉑相同地，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焦慮也是不遑多讓，^㉒學者如何能區分知識論差異而將不同理論予以分類為相同理論學派呢？現實主義內部也正在出現不同的知識論主張，例如 Francis A. Beers 等人的「後現實主義」(post-realism) 意圖使用後實證主義的修辭學 (rhetoric)，充實現實主義的知識論基礎。^㉓同樣地，以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二分法探討國際關係後設理論，也是過於狹隘了。實有必要探究多元的知識論是否更能使國際關係理論學派的分類更為精確，否則根本不是物以類聚的同好，反而是更為疏離的陌生人。不僅如此，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也就會出現更多的兩極化分類，既混淆了各理論之間的差異也阻礙了新理論觀點的產生。

柒、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爭論的影響

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常是始於非主流理論批判主流理論，它促使學者重新反思其學科本身的發展與研究，這正是各次大辯論的重要貢獻之一。從各次大辯論之後，國際關係學者對於理論研究的加強，說明了大辯論的確有助於增長國際關係的理論知識。尤其是第三次大辯論引發學者重新思考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但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應超越第三次大辯論，並反思地關切國際關係理論本身的存有、研究工具、知識，而重新界定此研究領域。然而，就後設理論而言，國際關係的主題，使它成為一門政治化的學科，並影響到學者閱讀文本的方法，以及理論化此世界的方法。因而，在分析的對象及研究的範圍（即研究的層次）、社會研究與政治研究的目的，以及研究國際關係的適當的方法論、國際關係研究的差異性等四點上，各研究途徑都有所不同。

但就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而言，以國際關係主題的複雜性，以及理論預測所與

註^⑳ Steve Smith, "Ref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47.

註^㉑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對反思性的探討，以及為何無法與主流理論相匹敵的原因，參閱 Inanna Hamati-Ataya, "Reflexiv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rospects for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gramme,"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Montreal Canada, March 16-19, 2011.

註^㉒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構計畫：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第 87 期（2006 年），頁 221~250。

註^㉓ Francis A. Beers, ed., *Post-Realism: The R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生俱來的哲學問題，各種不同的研究途徑只是強調重點或面向的差異，而非典範的競爭或研究綱領的進步或退步，它都是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知識的增長。後設理論辯論藉由質疑核心假定、提出替代解釋，以及改善模型規格，方法論的多元可以促進理論建構。^⑭此外，對於國際關係後設理論辯論的研究是希望協助學者更加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過程，而非局部與片段地認識個別的國際關係理論。所以，若能以學者觀點來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的話，就較能持平地看待國際關係後設理論辯論了。在國際關係理論碎裂（fragmentation）的期間，後設理論的論述與基礎的論述應該被視為是國際關係學科的活力與承諾，而不是其退化。而且這樣的論述將增加對世界政治的理解，以及掌握對實質理論問題的思考。^⑮

然而，誠如 Brian Schmidt 所言，相信後設理論可以提供有關如何研究國際政治的權威性解答，將會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⑯也有國際關係學者批判過去的科學哲學基礎辯論，並未有助於國際關係學科發展，而主張應該以哲學態度（attitude）而非哲學立場（position）看待，也應以實質的標準而非哲學的標準判斷國際關係理論。^⑰但這也引發了其他學者的批評，認為這並未能解決問題，反而使國際關係缺乏哲學基礎，但由於這樣的後設理論爭論促使許多探討國際關係後設理論議題的著作出版，例如探討「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關係」、^⑱分析層次與「因果與構成關係」，^⑲以及推論證據等等，^⑳還有探討國際關係研究方法的著作也陸續出版。^㉑這些著作是截然不同於以往國際關係領域所熟悉的著作，甚至著作中引述的參考文獻更是較多的其他學科著作，而非國際關係學科的著作。

註⑭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Conclusion: Multimeathod Research,"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 367.

註⑮ Alexander Wendt, "Bridging the Theory/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 383.

註⑯ Brian Schmidt, "Further Ahead or Further Beyond? The Debate over Positivism,"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1997), p. 111.

註⑰ Nuno P. Monteiro and Keven G. Ruby, "IR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1 (2009), pp. 15-48.

註⑱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註⑲ Milja Kurki,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laiming Caus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⑳ Richard Ned Lebow and Mark Irving Lichbach, eds., *Theory and Eviden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註㉑ Audie Klotz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 Audie Klotz and Deepa Prakash,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luralist Gui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總之，後設理論研究增加與豐富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層次（深度）與範圍（廣度），但後設理論要達成其全面的價值，就必須在某些方面與現實世界結合，否則令人不禁要問「在後實證主義之後，國際關係還是一門社會科學嗎？」，但或許應該更以多元論的科學觀看待國際關係理論，即國際關係理論的科學哲學基礎是多元的。^⑩這也正是後設理論爭論的貢獻了，使學者能知其所知與知其所不知，進而通達科學研究本身的限制與潛力，以建立或創新理論作為其研究的理想。

捌、結 論

國際關係理論學者為什麼要關切後設理論呢？誠如 Mark Neufeld 所言，後設理論是有能力的學術活動不可或缺的基礎，並且它攸關確保所發展出的解釋說明之適當性。^⑪這也是本文所要達到的企圖，但後設理論研究有其先天的限制，第一，國際關係學者本身對於相關科學哲學或哲學觀點的理解有限，除投入心力專研外（例如 Colin Wight、Fred Chernoff），就必須與哲學學科學者合作研究（例如 Steve Smith 與 Martin Hollis），但這多是少見。^⑫第二，國際關係學者本身對於後設理論研究的既定反對立場，實質理論研究較易理解，且與實務較為結合而能提出實質的分析及建議。後設理論則是抽象且多是沒有定論的爭論，既無法驗證也無法否證，僅是各說各話或是混合各方說法而陷入無謂的爭論，不免質疑後設理論研究能否產生與累積知識，進而反對或漠視後設理論研究。第三，國際關係後設理論學者本身對於後設理論研究也沒有共識，各自引述不同的科學哲學或哲學觀點，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觀點，建立自己的後設論述，或是簡化或重複哲學學科已有或過時的爭論。第四，國際關係後設理論學者本身之間沒有共識之外，反而不時相互以不同哲學觀點進行爭論，使其他學者對後設理論更為混淆，徒增後設理論研究的困擾，新進學者遂視其為畏途而不易增強研究的人力及水準。第五，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的教學並未將科學哲學或方法論納入教學，使學生未能了解後設理論的內容與重要性，也影響了後設理論研究的擴散。最後，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成果出版不易，尤其是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受限於後設理論研究是少數學者關注的議題，或是期刊編輯立場與觀點，論文審查過程中即面臨較多的問題，

註^⑩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188.

註^⑪ Mark 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p. 12-13.

註^⑫ 關於目前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哲學爭論，實已經超越當前國關的理解程度，這也是有些學者批評國關學者並未掌握哲學界對此議題的新論證，為呈現國關學界在此議題的爭論實況，因此本文並未將哲學界的爭論列入其中，而且仍是以國關學者對此議題的主張為引述來源，以求呈現國關學界實況。不僅如此，國關學者引用作為理論基礎的社會學、語言分析哲學…等等理論也出現這樣的爭議，即是國關學者囫圇吞棗引用，並未掌握相關的理論發展及內容，正引起部分學者的關注此議題。

諸如審查委員不易尋找，或是審查委員並未理解或是反對後設理論研究。^⑭

面對上述的限制，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學者所面臨的研究困境是多於實質理論研究學者，尤其是國內的國際關係學界，後設理論研究是極少數或邊緣的研究議題，加上國內相關學術期刊與書籍原就有限，更使後設理論研究成果不易擴展，更加使後設理論研究更為邊緣化。若是相較於國內政治學方法論的發展，不僅政治學方法論多已成為政治系所必修課程外，近年也致力翻譯英美國家著名的政治學方法論教科書，^⑮政治學的後設理論研究雖仍是少數，但政治學者多能約略理解。然而，國際關係方法論或後設理論研究則仍有待更多的學者投入研究與教學，或許可以效法國內政治學方法論的發展經驗，從開設的國際關係理論課程中增加有關後設理論的內容，翻譯相關教科書，增加研究成果的發表，在國際關係學會成立研究小組推動，到出版專業教科書或學術期刊，使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也能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並使國際關係方法論成為一門課程，務使國內國際關係研究能掌握後設理論研究的發展。

* * *

(收件：2012年3月6日，接受：2012年10月12日)

註^⑭ 有學者提出國關第三次大辯論是處於一種嚴重的理論認知倒退狀態。但本文並非憂慮也沒有認為第三次大辯論是處於一種嚴重的理論認知倒退狀態。反而是認為是進步的狀態，只是這樣的狀態，學者各有不同想法。實有必要參考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進行多年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研究，針對1980、1990年代第三次大辯論出現的後實證主義國關理論及後設理論對國內國際關係理論的教學與出版之影響，以經驗實證方式（包括問卷、分析授課計畫與深度訪談等）探討，藉由統計分析呈現目前的實況及所面臨的危機與轉機。

註^⑮ 例如陳義彥等譯，*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台北：韋伯文化，2009年）；徐子婷譯，*政治學分析的途徑：批判導論*（台北：韋伯文化，2009年）。

Exploring the Metatheoretical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flections on the Scientific Process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cipline

Tahua M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third Great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ebate between (Neo) Realism and (Neo) Liberalism has been well known; whereas the metatheoretical debate between Positivism and Postpositivism have been ignored. Postpositivism questioned the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t has caused the scholars to wonder whether metatheoretical researches exert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stpositivism is concerned with the metatheoretical dimension and not the substantial dimension. Metatheory is a theory of theory, a theory about theory, and a theoretically thinking on theory to identify good theories.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metatheoretical debates, along with related critical issues, and the effects on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hoped that domestic scholars may begin to understand this unfamiliar scope, and develop the methodology for this necessary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 Metatheory,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cture and Agency, Levels of Analysis,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參考文獻

-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橋計畫：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第 87 期（2006 年），頁 221~250。
- 莫大華，「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政治科學論叢*，第 31 期（2007 年），頁 175~216。
- 黃旻華、郭銘傑，「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國際關係學門的誤用：重新檢視現實主義典範進步或退化的辯論」，*東吳政治學報*，第 24 期（2006 年），頁 117~160。
-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心物二元論—Alexander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評」，*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29~58。
- Adler, Emanuel,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pp. 319~363.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 Axelrod, Robert, *The Complex of Cooperation: The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eers, Francis A., ed., *Post-Realism: The R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ennett, Andrew and Colin Elman, "Qualitative Researc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ase Study Method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2006), pp. 455~476.
- Bieler, Andreas and Adam David Morton, "The Gordian Knot of Agency-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Neo-Gramscia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1 (2001), pp. 5~35.
- Bieler, Andreas and Adam David Morton, "The Gordian Knot of Agency-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Neo-Gramscia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1 (2001), pp. 5~35.
- Bohman, James, "What is to be don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88~498.
- Bousquet, Antoine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43~62.
- Booth, Ken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Brams, Steven J., "Game Theory in Practic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Applying It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81~96.
- Braumoeller, Bear F. and Anne E. Sartori,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Statistics i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p. 129~151.
- Buzan, Barry,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Steve Smith and Ken Boo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Oxford: Polity Press, 1996), pp. 198~216.
- Caprioli, Mary, “Feminist IR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2 (2004), pp. 253~269.
- Carlsnaes, Walter, “The Agency-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3 (1992), pp. 245~270.
- Chan, Stephen, “An Ontologist Strikes Back: A Further Response to Hollis and Smit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3 (1998), pp. 441~443.
- Chernoff, Fred, *Theory and Meta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s and Contending Accou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Chernoff, Fred, “Defending Fou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66~477.
- Christensen, Thomas J. and Jack Snyder,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Degenerate Allia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19~922.
- Collier, David and Colin Elman,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Publication, and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on,” in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79~795.
- de Mesquita, Bruce Bueno, “Accomplish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A Game-Theoret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59~80.
- Derian, James Der, *Virtuous War: Mapp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 Media-Entertainment Network*,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 Dessler, David,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1989), pp. 441~473.
-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 Doty, Roxanne Lynn, “Aporia: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pp. 365~392.
- Doty, Roxanne Lynn, “A Reply to Colin W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 (1999), pp. 387~390.

- Earnest, David C., "Coordination in Large Numbers: An Agent-based Model of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2 (2008), pp. 363~382.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Introduction: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20.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3).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 Elman, "How Not to Be Lakatos Intolerant: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2 (2002), pp. 231~262.
- Fearon, James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67; pp. 52~54.
- Friedman, Gil and Harvey Starr, *Agenc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Ontology to Empirical Inqui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 Geller, Daniel S. and John A. Vasquez, eds., *The Construction and 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 Halliday, Fre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ars and Hopes,"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8~327.
- Hamati-Ataya, Inanna, "Reflexiv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rospects for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gramme,"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Montreal Canada, March 16-19, 2011.
- Harvey, Frank P.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 Hellmann, Gunther, "In Conclusion: Dialogue and Synthesis in Individual Scholarship and Collective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2003), pp. 147~150.
- Hoffman, Matthew J., "Agent-based Modeling," in Audie Klotz and Deepa Prakash,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luralist Gui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87~208.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Beware of Gurus: Structure and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93~410.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Structure and Action: Further Com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 (1992), pp. 187~188.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Two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0, No. 3 (1994), pp. 241~251.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A Response: Why Epistemology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1996), pp. 111~116.
- Holsti, Kalevi J., "Along the Roa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the Next Millennium: Four Travelogues," in Robert M.A. Crawford and Darryl S.L. Jarvi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SUNY Press, 2001), pp. 73~99.
- Hudson, Natalie Florea, "The State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IR: An Analytical Surv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2 (2010), pp. 165~192.
- Jabri, Vivienne and Stephen Chan, "The Ontologist Always Rings Twice: Two More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Reply to Hollis and Smit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1996), pp. 107~110.
- James, Patrick Thadde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Structural Realism Reconsidered*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Hegel's House, or 'Peoples are States to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81~287.
-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Foregrounding Ontology: Dualism, Monism, and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8), pp. 129~153.
-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A Faulty Solution to a False (ly characterized) Problem: A Comment on Monteiro and Ruby,"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55~465.
-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Jarvis, D.S.L.,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Defending the Disciplin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
- Jones, Adam, "Interview with Kal Holsti,"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3 (2002), pp. 619~633.
- Jordan, Richard, et al., *One Discipline or Many?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en Countries* (Williamsburg, VA: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2009).
- Joseph, Jonathan, "Hegemony and the Structure-Agenc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cientific Realist Contribu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8), pp. 109~128.
- Kaplan, Morton A.,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57).
- Keohane, Robert,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1~157.
- Keohane, Robe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88), pp. 379~396.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lotz, Audie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E. Sharpe, 2007).
- Klotz, Audie and Deepa Prakash, "Introduction," in Audie Klotz and Deepa Prakash,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luralist Gui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7.
- Klotz, Audie and Deepa Prakash,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luralist Gui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Kurki, Milja,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laiming Caus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urki, Milja, "The Politics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40~454.
- Kurki, Milja and Colin Wi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35.
- Kydd, Andrew H.,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Rational Choice,"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25~443.
- Lake, David A.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Lake, David A.,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p. 465~480.
- Lakatos, Imre, "Falsific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91~195.
- Lebow, Richard Ned and Mark Irving Lichbach, eds., *Theory and Eviden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Levy, Jack S.,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87~112.
- Lijhart, Arend, "The Structure of Theoretical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8, No. 1 (1974), pp. 41~74.
- Maliniak, Daniel,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p. 437~464.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on C. Pevehouse,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81~498.
- Mercado, Raymond, "Keep Muddl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78~487.
- Monteiro, Nuno P. and Keven G. Ruby, "IR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1 (2009), pp. 15~48.
- Monteiro, Nuno P. and Keven G. Ruby, "The Promise of Foundational Prudence: 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2009), pp. 499~512.
- Moore, Cerwyn and Chris Farrand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hilosophy: Interpretive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 Morgenthau, Hans,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78).
- Neufeld, Mark,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p. 11~35.
- Neumann, Iver B., "Beware of Organicism: The Narrative Self of the 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59~267.
- Nicholson, Michael, "Formal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23~42.
- O'Neill, Kate, Jorg Balsiger, and Stacy D. VanDeveer, "Actors, Norms, and Impact: Rec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7, No. 1 (2004), pp. 149~175.
- Patomaki, Heikki, "How to Tell Better Stories about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1 (1996), pp. 105~133.
- Pouliot, Vincent, "'Subjectivism':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07), pp. 359~384.
- Ray, James Lee, "Reflections on Millennia, Old and New: The Evolution and Role of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103~115.
- Ray, James Lee, "Integrating Levels of Analysis in 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3, No. 4 (2001), pp. 355~388.
- Reus-Smit, Christian,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al,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Ruggie, John Gerard,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 (London: Routledge, 1997).
- Schmidt, Brian, "Further Ahead or Further Beyond? The Debate over Positivism,"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1997), pp. 107~112.
- Shaw, Karena, "Knowledge, Foundations,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4 (2004), pp. 7~20.
- Singer, J. Davi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12, No. 3 (1960), pp. 453~461.
- Singer, J. David, "One Man's View: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in Charles Gochman and Alan Sabrosky, eds., *Prisoners of War? Why Nation-States in the Modern Era*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0), pp. 11~28.
- Smith, Steve,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44.
- Smith, Steve,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83~188.
- Smith, Steve, "Ref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4~249.
- Smith, Stev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2002), pp. 67~86.
- Smith, Steve,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23~243.
- Snidal, Duncan, "Formal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p. 227~264.
- Sorensen, Georg,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83~100.
- Sprinz, Detlef F.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Conclusion: Multimeathod Research,"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 367.
- Sprout,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 1956).
- Sprout,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A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8).
- Starr, Harvey, "‘Opportunity’ and ‘Willingness’ as Ordering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Wa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4, No. 4 (1978), pp. 363~387.
- Starr, Harvey, "Cumulation, Synthesis, and Research Design for the Post-Wave,"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43~58.
- Stears, Jill,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sues, Debat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New York: Polity, 2006).
- Thies, Cameron G., "Are Two Theories Better than One? A Constructivist Model of Neorealist-Debat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5, No. 2 (2004), pp. 159~183.
- Vasquez, John A.,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A Critique*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Vasquez, John A., "The Post-Positivist Debate: 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Enqui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Enlightenment’s Fall,"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7~240.
- Vasquez, John A.,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899~912.
- Vasquez, John A.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Waever, Ole, "Figure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Introducing Persons Instead of Paradigms," in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1~37.
- Waever, Ol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9~185.
- Waltz, Kenneth N.,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 Weber, Cynth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 Wendt, Alexander,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335~370.

- Wendt, Alexander, "Bridging the Theory/meta-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83~392.
- Wendt, Alexander, "Levels of Analysis Versus Agents and Structure: Part III,"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 (1992), pp. 181~185.
- Wendt, Alexander,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Special Issue (1998), pp. 105~147.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endt, Alexander,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89~316.
- Wight, Colin, "They Shoot Dead Horses Don't They? Locating Agency in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1 (1999), pp. 109~142.
- Wight, Colin, "Interpretation All the Way Down? A Reply to Roxanne Lynn Do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3 (2000), pp. 423~430.
- Wight, Col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23~51.
- Wight, Colin, "State Agency: Social Action without Human Activ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69~280.
- Wight, Colin,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